

# 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心理学印证

## ——道德情绪的特征及其对道德行为的影响机理

王云强<sup>\*</sup>

**【摘要】** 理性主义伦理学强调理性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理论为其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学依据。情感主义伦理学突出情感的动机力量,而当前的道德情绪研究能够对此充分证实。道德情绪指的是在对自己或他人进行道德评价时产生的一种复合情绪,能够影响道德行为的产生和改变。自豪、内疚、移情和钦佩等道德情绪不仅能够激发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而且与反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羞耻和愤怒等道德情绪容易引发个体的不良行为或反社会行为。今后的道德情绪研究应注重探究文化在道德情绪中的作用、道德情绪的认知神经机制、集体道德情绪、道德情绪的实践应用和哲学思考等。

**【关键词】** 情感主义伦理学;道德情绪;自我意识情绪;他人指向道德情绪;道德行为

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是探讨道德动机问题的两条基本思路。以科尔伯格为代表的道德认知理论受康德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影响,强调道德行为的力量来自道德认知或道德判断,认为成熟的道德认知是成熟的道德行为的前提条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情绪的道德动机力量,在道德情绪领域开展了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为休谟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提供了强力支持。本文拟结合新近研究,对道德情绪的概念、特点及其对道德行为的影响等进行进一步探讨。

### 一、道德情绪的概念与种类

较早对道德情绪进行探讨的是 Hoffman 和 Eisenberg。在 Hoffman (2000) 看来,情绪之所以成为道德动机的主要力量,是因为移情等情绪能够把“冷的”说教情境下习得的抽象的道德原则转化为亲社会的“热”认知。Eisenberg (2000) 把内疚、羞耻和移情等在道德行为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情绪称作道德情绪。Haidt (2003a) 曾对道德情绪的含义、类型等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道德情绪就是那些

<sup>\*</sup>心理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人员,210097。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青年道德心理特点及教育对策研究”(14CSH017)研究成果。

与整个社会或者至少个体的利益或幸福有关的情绪。道德情绪具有两个重要成分：无私的诱发因素和亲社会行为倾向。个体违背道德规范时产生的情绪或遵守道德规范时所产生的情绪都可被称为道德情绪。周详等人（2007）指出，道德情绪是个体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时所产生的的一种情绪体验。概而言之，道德情绪指的是在对自己或他人进行道德评价时产生的、影响道德行为产生或改变的一种复合情绪。

道德情绪存在多种分类方法。Eisenberg（2000）认为，道德情绪主要有两类：一是自我意识的道德情绪，包括内疚和羞耻；二是移情。Haidt（2003a）则把道德情绪分为四类：谴责别人的情绪（包括蔑视、愤怒和厌恶、愤慨和憎恨等）、自我意识的情绪、他人痛苦指向的情绪和赞赏他人的情绪。Tangney等（2007）把道德情绪分为自我意识情绪、他人指向的道德情绪和移情三大类。Rudolph等（2013）根据情绪的指向对象，把道德情绪区分为道德行动者情绪和道德观察者情绪。

当然，道德情绪在性质上有正性和负性之分。因此，综合上述研究，可以按照情绪指向（自己和其他人）和情绪性质（正性和负性）把道德情绪分为四类：正性自我意识情绪、负性自我意识情绪、正性他人指向道德情绪和负性他人指向道德情绪。

## 二、自我意识情绪及其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自我意识情绪的思想最早可见于达尔文的名著《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直到20世纪90年代，自我意识情绪研究才正式开启。自我意识情绪是一种以自我参照行为的出现为前提，并通过自我觉察、自我评价和自我反思而产生的情绪，它在我们的情绪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

### （一）自豪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自豪（pride）是常常被人忽视的正性道德情绪。Mascolo和Fischer（1995）认为，自豪源自这样一种评价，即个人应该为某一社会价值结果或者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而负责。自豪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为了增强或维持个体在社会层级中的地位而提升思维、深化感受和促进行为。这种作用至少有以下三条路径：因成就而体验到的自豪能够激发对未来成就的追求；自豪具有信息功能，易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价值；自豪的非言语表情会被识别为高社会地位的信号，而且具有跨文化性（Shariff, Zhao & Henrich, 2013）。

自豪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自大的自豪（hubris pride）或 $\alpha$ 自豪，另一种是真正的自豪或 $\beta$ 自豪。从产生来看，自大的自豪来自于内部的、整体的、稳定的和不可控的自我归因（例如，我成功是因为我伟大），个体肯定的是整体自我；而真正的自豪来自于内部的、具体的、不稳定和可控的归因（例如，我成功是因为我进行了大量的练习），个体肯定的是自我某方面的具体行为（Tracy & Prehn, 2012）。

自大的自豪与真正的自豪能够引发不同的社会行为，具有迥异的道德价值。总体而言，自大的自豪与反社会行为密切相关，而真正的自豪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自大的自豪能够引发自恋性的攻击、敌意、人际问题和其他自我破坏性的行为；真正的自豪可以激发成就领域的积极行为、亲社会行为和真正深刻的自尊感（Williams & DeSteno, 2008）。自大的自豪特质水平高的个体更有可能表现出行为冲动，更有可能体验到长期的焦虑，更有可能实施攻击、敌意和其他各类反社会的不当行为（例如，吸毒和轻度犯罪）；真正的自豪特质水平高的个体，倾向于表现出低水平的抑郁、特质焦虑、社交恐怖、攻击、敌意和拒绝敏感度，以及高水平的自我控制、目标参与、关系满意度、婚姻适应性和社会支持（Carver, Sinclair & Johnson, 2010）。

## （二）内疚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对内疚 (guilt) 的心理学研究由来已久。弗洛伊德认为,内疚是在幼年时受到父母惩罚或遭到抛弃后所引发的焦虑状态,儿童把指向父母的敌意转向内部并体验为内疚感。罗洛·梅将内疚等同于焦虑,认为它是人的基本存在。Hoffman (2000) 提出了基于移情的内疚理论,将内疚界定为一种轻视、厌恶自己的痛苦体验,通常伴有迫切、紧张和后悔。他主张,除违规内疚外,还存在虚拟内疚,即尽管人们实际上并没有做伤害他人的事情,或所作所为并没有违犯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但如果他们以为自己做了错事或与他人所受到的伤害有间接关系,也会感到内疚。

内疚具有重要的道德动机功能,能够促使个体认可自己的道德责任,并采取补偿行为。Tangney 和 Dearing (2002) 的一个研究表明,处于少年期的易于体验到内疚的五年级学生,更不可能被拘留、判刑和监禁。他们更有可能进行安全的性行为,更不可能吸毒。当控制了家庭经济收入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研究还显示,内疚易感性与青少年犯罪存在显著负相关,内疚易感性高的大学生更不可能吸毒和酗酒。即使对于那些已经患有危险行为的成人,内疚易感性似乎能够发挥保护作用。一项对监狱囚犯的纵向研究发现,入狱后不久评定的内疚易感性能够显著反向预测获释后第一年的再次犯罪和药物成瘾 (Tangney, Mashek & Stuewig, 2007)。

当然,内疚也有可能产生不良适应行为或不道德行为。当人们对超出自我控制的事件产生过度的或扭曲的责任感时,内疚就容易引发不良适应行为。Nelissen 和 Zeelenberg (2009) 的研究发现,当没有机会实施补偿行为时,内疚易于引发自我否认和自我惩罚。因此,只有当人们为自己的过错承担适当的责任,承认自己的失败和违规,并且利用情绪的动机力量来形成和实施与违规程度相符的补偿行为时,内疚才具有最佳道德动机功能。

## （三）羞耻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羞耻 (shame) 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主题。羞耻是一种基于对整体自我的消极评价的,伴随有渺小感、无价值感、无力感的痛苦自我意识情绪 (Tangney & Tracy, 2012)。当个体对诱发事件进行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整体的自我归因时会产生羞耻,而当个体对此进行不稳定的、特定方面的自我归因则会引发内疚,但诱因事件一定与无法实现自我认同的目标有关。

研究表明,羞耻容易引发许多适应不良行为或反社会行为。很多研究表明,在面对失败或违规时,羞耻常会激发个体的拒绝、隐藏或逃避行为;经诱发感受到羞耻的被试会表现出更少的移情和观点采择 (Yang, Yang & Chiou, 2010);羞耻易感性与愤怒、敌意和指责他人、直接的身体或语言攻击、间接攻击 (损害对他人重要的事情、背后议论他人)、替代性攻击、自我攻击呈显著正相关 (Farmer & Andrews, 2009)。

但是,也有研究并未发现羞耻对犯罪等反社会行为的预测效应 (Robbins, Robert, Strayer & Koopman, 2007)。甚至有研究者提出,羞耻具有积极的社会适应价值。

## （四）尴尬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尴尬 (embarrassment) 是在公共社会窘境中产生的一种屈辱、羞耻和懊恼的厌恶状态 (Miller, 1995)。当个体违背了社会习俗规则,或者是因为事件或行为超出了自己的控制时,会体验到尴尬情绪。

与内疚和羞耻相比,尴尬与道德之间的联系要相对弱些。例如,成人对引发个人内疚、羞耻和尴尬事件的评定显示,他们在感到尴尬时比感到内疚和羞耻时更不可能考虑道德问题 (Tangney, Miller, Flicker & Barlow, 1996)。内疚和羞耻源于较为严重的失败或对道德规范或道德准则的侵犯,而尴尬

则是对社会常规的轻微侵犯或失礼。尴尬具有自我调节功能,易于尴尬的被试倾向于高度意识到并看重社会规范和标准。有研究表明,与适应良好的男孩相比,有攻击性的过失男孩表现出更少的尴尬 (Tangney & Tracy, 2012)。

### 三、他人指向道德情绪及其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自我意识情绪源自根据道德标准对自我进行的审视和评价,而他人指向道德情绪产生于对他人的道德评价。移情、钦佩和感激等正性他人指向情绪,以及愤怒和蔑视等负性他人指向情绪在道德活动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

#### (一) 移情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移情 (empathy, 也译为共情) 是至今探讨最多的道德情绪。对移情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英国著名哲学家亚当·斯密。Hoffman (2000) 认为,移情是对知觉到他人情绪体验的一种设身处地的情绪反应,或者是由于从他人的立场出发对他人内在的状态的认知而产生的一种对他人的情绪体验; Eisenberg 等 (2006) 提出,移情是一种与他人的感受相同或相近的情绪性反应,这种情绪性反应来自对他人的情绪状态或情境的认知。概而言之,移情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情绪反应能力,是既能分享他人情感、对他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又能客观理解、分析他人情感的能力。

移情是一种重要的亲社会动机,能够引发个体的助人等亲社会行为。McMahon 等 (2006) 的研究表明,移情水平高的青少年报告出了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且这一效应在女性群体上尤其显著。Marsh 和 Ambady (2007) 研究发现,被试对恐惧面部表情的辨别准确度和随后的助人行为呈正相关,这表明对他人痛苦的觉知同亲社会行为紧密关联。个体的内隐助人倾向与移情能力显著相关,高移情个体具有内隐助人倾向,而低移情个体的内隐助人倾向不明显 (程德华、杨治良, 2009)。此外,移情还会在亲社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李晓明等 (2012) 发现,移情反应在道德强度对企业道德决策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个体的道德强度越高,其移情反应也越高,最终也会做出更加合乎道德的决策。

移情与攻击等反社会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许多研究发现,低的认知移情与攻击行为存在高度正相关;破坏性行为障碍男孩的移情得分偏低、表现出情感移情缺陷;低水平移情能力是青少年欺负、攻击行为的危险因素 (Gini & Albiero, 2007);冷漠—非情绪性特质高的儿童表现出最低的情绪移情和最高的直接欺负行为 (Munoz, Qualter & Padgett, 2011)。

当然,也有研究对移情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Einolf (2008) 的大样本数据分析显示,14 种亲社会行为中与移情性关注存在真正显著相关的只有 3 种,而且都是非正式的助人行为、且需要受助者必须在施助者面前。同样,亦有研究并不支持移情与攻击、欺负等行为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 (Batanova & Loukas, 2011)。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深入考察移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

#### (二) 钦佩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钦佩 (admiration) 是在观察到他人的道德的、值得赞扬的和非凡的行为时产生的积极情绪。它也可被理解为对优秀他人或榜样的一种高度的喜欢和尊敬 (Becker & Luthar, 2007)。Haidt (2003b) 通过让被试回忆“人性‘高尚’或‘善良’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对钦佩进行现象学考察。结果表明,随着注意力转向外部,那些报告内心感到温暖、愉快和刺痛的被试,会感到对他人是坦诚公开的,受到激发



去帮助他人和超越自我。钦佩的典型成分是欣赏和鼓舞。

钦佩可分为美德钦佩和能力钦佩感 (Immordino-Yang, McColl, Damasio & Damasio, 2009)。美德钦佩是当人们看到他人意想不到的美德行为时所产生的一种温暖的、向上提升的情绪。研究表明,美德钦佩感则会激发亲社会动机和行为。Vianello 等 (2010) 采用实验法和问卷法调查了公司员工、医院护士和学前教育教师,结果发现领导者的自我牺牲和人际公平等美德行为影响着下属的钦佩感,进而影响下属的组织承诺和组织身份行为,比如利他、礼貌和服从。

### (三) 感激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感激 (gratitude, 也译为感恩、感戴等) 也是一种他人指向的积极道德情绪。对他人的仁慈善举的反应容易引发人们的感激。也就是说,当人们是他人好处的受惠者,尤其是那些好处是预料之外的或者施惠者为此付出代价时,感激就会产生。感激不同于负债感 (indebtedness),前者是一种愉快的情绪状态,后者是与义务相连的一种消极情绪状态。

McCullough 等 (2001) 提出,感激的道德性质体现在两个方面:①感激产生于施惠者的道德行为 (例如,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等);②感激引发受惠者随后的道德动机。研究显示,感激者常常受到激发而做出亲社会行为,这些行为不仅是针对其施惠者,而且还针对与感激事件无关的其他人。而且,感激的表达可被看作道德强化物,能够激发施惠者未来的助人行为。总之,感激的道德功能可概括为三点:道德计量功能、道德动机功能和道德强化功能。此外,感激具有重要的心理成长功能。一系列研究显示,感激能够增强心理韧性、心理健康和日常生活的质量。无论是特质性感激还是情境性感激,均与非临床被试 (Frederickson, Tugade, Waugh & Larkin, 2003) 的心理幸福感和适应性行为密切相连。

### (四) 愤怒和蔑视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愤怒 (anger) 虽然是行为的动机力量之一,但是其动机方向具有不确定性。既与趋近动机有关,又与回避动机相连;愤怒与趋近动机的关系具有优先性与一般性,而愤怒与回避动机的关系则是有条件的、受情境制约 (杜蕾, 2012)。众所周知,愤怒与个体的攻击行为关联密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愤怒的类别之一,义愤具有一定的道德功能。一般愤怒的重点是对真实的或潜在的自我伤害的知觉以及对冒犯的他人的意图和/或责任的归因。而义愤源于这样一类事件:一个人不必亲身体验到伤害,却目睹见证了针对第三方的道德过失行为。Rozin 等 (1999) 的研究显示,对自律道德的违反特别容易引发义愤,进而能够激发第三方旁观者采取行动来补偿所看到的不公平。此外,蔑视与道德行为也有一定的关联。研究发现,蔑视与对群体道德的违反 (例如,对社会阶层的违背) 有关 (Rozin, Lowery, Imada & Haidt, 1999)。

## 四、总结与展望

随着研究的不断积累,人们已经对道德情绪的概念、特点及其对道德行为的作用等问题有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适当性。为进一步推动今后的道德情绪研究,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和努力。

1. 文化对道德情绪的影响。当前的道德情绪研究的许多成果主要基于西方文化,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比如,西方文化属于个体主义文化,中国文化属于集体主义文化。Scollon 等 (2005) 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中自豪是一种相对负性的情绪,体验到自豪的个体同时也更多地体验

到了焦虑和内疚等负性情绪。此外,中国人的自豪不仅仅基于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而且常常来源于对集体价值的认同。因此,很有必要对文化因素在道德情绪中的作用进行深入探究,才能揭示中国人的道德情绪特点。

2. 道德情绪的神经机制。已有研究对道德情绪的神经机制进行了考察,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功。比如,与理解他人的想法相比,认知移情更强地激活了左侧的腹内侧前额叶;情感移情有可能是前脑岛、扣带回和镜像神经系统等脑区相互作用的结果(Raz, Jacob, Gonen, Winetraub, Flash, Soreq & Hendler, 2013)。但是目前相关的神经机制研究主要在移情、内疚和钦佩等少数道德情绪上,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明其他道德情绪的脑机制。

3. 集体道德情绪。集体道德情绪指的是在道德领域中产生的集体情绪,是大多数成员因集体中他人的行为是否违背道德而产生的情绪;它既指发生在集体中的道德情绪,也指因为道德事件而诱发的集体情绪(刘晓洁、李丹, 2011)。虽然有研究开始对集体内疚、集体羞耻进行探讨,但是仍处于起步阶段,应该加强集体情绪的发生机制、对群体和个体行为的影响及跨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4. 道德情绪的实践应用。在持续推进道德情绪的实证研究的同时,应该注重相关成果的实践应用。例如,如何通过提高社会成员的移情、自豪等正性社会情绪来增进其道德行为?如何通过激发社会成员适当的内疚、义愤来抑制其不道德行为?如何在学校道德教育中培养学生的道德情绪?

5. 道德情绪的哲学思考。科尔伯格基于理性主义,提出了道德发展的心理学理论,进而开展道德教育实践,最后又归于哲学反思。这对于当前的道德情绪研究具有重大借鉴意义。道德情绪的哲学思考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情绪与情感主义道德哲学的关系,包括道德情绪研究的具体哲学假设、道德情绪研究又是如何支持情感主义道德哲学的。二是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即如何根据已有的道德认知、道德情绪的研究成果来整合情感与理性的关系,进而准确阐明道德的心理学机制。

## 参考文献:

- 程德华、杨治良, 2009:《移情能力与内隐助人倾向的相关研究》,《心理科学》第6期。
- 杜蕾, 2012:《愤怒的动机方向》,《心理科学进展》第11期。
- 李晓明、傅小兰、王新超, 2012:《移情在道德强度对企业道德决策影响中的作用》,《心理科学》第6期。
- 刘晓洁、李丹, 2011:《集体道德情绪研究述评》,《心理科学》第2期。
- 周详、杨治良、郝雁丽, 2007:《理性学习的局限:道德情绪理论对道德养成的启示》,《道德与文明》第3期。
- Becker, B. E. & S. S. Luthar, 2007, "Peer-perceived admiration and social preference: 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positive peer regard among suburban and urb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vol.17, pp.117—144.
- Bennett, L., M. W. Ross & R. Sunderland, 199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ognition, rewards, and burnout in AIDS caregiving", *AIDS Care*, vol.8, pp.145—153.
- Carver, C. S., S. Sinclair & S. L. Johnson, 2010, "Authentic and hubristic pride: Differential relations to aspects of goal regulation, affect, and self-contro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vol.44, pp.698—703.
- Einolf, C. J., 2008, "Empathic concern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A test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using survey dat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37, pp.1267—1279.
- Eisenberg, N., 2000,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1, pp.665—697.
- Eisenberg, N., R. A. Fabes & T. L. Spinrad, 2006, "Prosocial development", in W. Damon & N. Eisenberg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3.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 6<sup>th</sup> ed. ), New York: Wiley, pp.646—718.

Farmer, E. & B. Andrews, 2009, “Shameless yet angry: Sham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anger in male young offenders and undergraduate controls”,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 Psychology*, vol.20, pp.48—65.

Frederickson, B. L., M. M. Tugade, C. E. Waugh & G. R. Larkin, 2003, “What good are positive emotions in crises? A prospective study of resilience and emotions follow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the United States on September 11, 2001”,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84, pp.365—376.

Gini, G. & P. Albiero, 2007, “Does empathy predict adolescents’ bullying and defending behavior? ”, *Aggressive Behavior*, vol.5, pp.467—476.

Haidt, J., 2003a, “Elevation and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of morality”, in C. L. M. Keyes & J. Haidt ( eds. ), *Flourishing: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Life Well-liv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p.275—289.

Haidt, J., 2003b, “The moral emotions”, in R. J. Davidson, K. R. Scherer & H. H. Goldsmith ( eds. ),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852—870.

Hoffman, M. L., 2000, *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 Implication for Caring and Justi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mmordino-Yang, M. H., A. McColl, H. Damasio & A. Damasio, 2009, “Neural correlates of admiration and compassion”, *Neuroscience*, vol.106, pp.8021—8026.

Marsh, A. A. & N. Ambady, 2007, “The influence of the fear facial expression on prosocial responding”, *Cognition and Emotion*, vol.21, pp.225—247.

Mascolo, M. F. & K. W. Fische, 1995, “Develop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appraisals for pride, shame, and guilt”, in J. P. Tangney & K. W. Fischer ( eds. ), *Self-conscious Emotions: Shame, Guilt, Embarrassment, and Prid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64—113.

McCullough, M. E., S. Kilpatrick, R. A. Emmons & D. Larson, 2001, “Is gratitude a moral effec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127, pp.249—266.

McMahon, S. D., J. Wemsman & A. L. Parnes, 2006, “Understanding prosocial behavior: The impact of empathy and gender among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vol.39, pp.135—137.

Miller, R. S., 1995, “On the nature of embarrassability: Shyness, social-evaluation, and social skil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63, pp.315—339.

Munoz, L. C., P. Qualter & G. Padgett, 2011, “Empathy and bullying: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vol.42, pp.183—196.

Nelissen, R. M. A. & M. Zeelenberg, 2009, “Moral emotions as determinants of third-party punishment: Anger, guilt, and the functions of altruistic sanctions”,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vol.4, pp.543—553.

Raz G., Y. Jacob, T. Gonen, Y. Winetraub, T. Flash, E. Soreq & T. Hendler, 2013, “Cry for her or cry with her: Context-dependent dissociation of two modes of cinematic empathy reflected in network cohesion dynamics”, *Social Cognitive & Affective Neuroscience*, vol.9, pp.30—38.

Robinson, R., W. L. Roberts, J. Strayer & R. Koopman, 2007, “Empathy and emotional responsiveness in delinquent and non-delinquent adolescents”, *Social Development*, vol.16, pp.555—579.

Rozin, P., L. Lowery, S. Imada & J. Haidt, 1999, “The CAD triad hypothesis: A mapping between three moral emotions ( contempt, anger, disgust ) and three moral codes ( community, autonomy, divinity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76, pp.574—586.

Rudolph, U., K. Schulz & N. Tschakertschew, 2013, “Moral emotions: An analysis guided by Heider’s naive action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s in Psychology*, vol.2, pp.69—92.

Scollon, C. N., E. Diener, S. Oishi & R. Biswas-Diener, 2005, “An experience sampling and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affect”, *Cognition & Emotion*, vol.19, pp.27—52.

Tangney, J. P. & R. L. Dearing, 2002, *Shame and Guilt*, New York: Guilford.

Tangney, J. P., D. Mashek & J. Stuewig, 2007, “Working at the social-clinical-community criminology interface: The GMU inmate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6, pp.1—21.

Tangney, J. P., J. Stuewig & D. J. Mashek, 2007, “Moral Emotions and Moral Behavior”,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8, pp.345—72.

Tangney, J. P. & J. L. Tracy, 2012, “Self-conscious emotion”, in M. Leary & J. P. Tangney (eds.), *Handbook of Self and Identity* (2<sup>nd</sup> ed.), New York: Guilford, pp.446—478.

Tracy, J. L. & C. Prehn, 2012, “Arrogant or self-confident? The use of contextual knowledge to differentiate hubristic and authentic pride from a single nonverbal expression”, *Cognition & Emotion*, vol.26, pp.14—24.

Tracy, J. L., A. F. Shariff, W. Zhao & J. Henrich, 2013, “Cross-cultural evidence that the nonverbal expression of pride is an automatic status sign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vol.142, pp.163—180.

Williams, L. A. & D. DeSteno, 2008, “Pride and perseverance: The motivational role of prid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94, pp.1007—1017.

Vianello, M., E. M. Galliani & J. Haidt, 2010, “Elevation at work: The effects of leaders’ moral excellence”,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vol.5, pp. 390—411.

(责任编辑:蒋永华)

## Psychological Proof of Emotionalist Ethics: Representation of Moral Emotions and Its Influence on Moral Behavior

WANG Yun-qiang

**Abstract:** Rationalist ethics emphasizes the role of reason in moral behavior, and Kohlberg’s moral cognitive theory has provided solid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it. Emotionalist ethics stresses the motivational power of emotion, and current studies on moral emotion have confirmed this viewpoint. Moral emotions are many kinds of mixed emotion as a result of moral evaluation about self and other which can influence the generation and change of moral behavior. Pride, guilt, empathy and admiration can motivate individual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correlate negatively with antisocial behaviors significantly. Shame and anger are apt to cause misbehaviors and antisocial behaviors. Future research on moral emo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role of culture in moral emotion, neurological mechanism of moral emotion, collective moral emoti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moral emotion.

**Key words:** emotionalist ethics; moral emotion; self-conscious emotion; other-focused moral emotion; moral behavior